马骕《绎史》的史学价值

高　平

《绎史》是清代史家马骕所著，素以研究三代之精著称于世。因此，马骕被世人誉之为"马三代"。今日重读《绎史》，深感其于史学建树颇多，其成就主要从历史编纂学及进步的史学思想两方面表现出来。

一、《绎史》在历史编纂学上的突出成就

1、广搜博采，资料之富堪称先秦诸史之冠。

《绎史》录先秦之书籍，基本上做到搜括无遗并能加以科学分类。据不完全统计，马骕著《绎史》，搜集各种资料近 200 多种，他把这些史籍分成下述八类。

经传子史与比较可信的文献。《十三经》、《大戴礼记》、《国语》、《国策》、《老子》、《列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孙子兵法》、《三略》、《司马法》等。上述诸书，全书具在，是流传比较完整又可靠的资料，使用价值较高。

真伪错杂的资料。《鬼谷子》、《鹖冠子》、《孔子家语》、《孔丛子》等。这些文献，有的是原有其书，经后人添加了不少内容，有的是原书已佚，由后人补窜的。所以这类文献真伪错杂，极须认真鉴别。

全属伪书类的文献。《三坟》、《子华子》、《子陵子》等，这类文献多是后世之人托名伪作，可信度较小，所以他仅取了几种，多数都被摒弃。

文笔高古而不完全可信的文献。《神农本草》、《黄帝素问》、《阴符经》、《风后握机经》、《穆天子传》、《山海经》、《逸周书》、《竹书纪年》等，这些书籍不一定都是当时人的著作，但多数当属先秦文献。

汉魏以来，史家文人称述先秦史的著作。《史记》、《汉书》、《后汉书》、《白虎通》、《风俗通》、《淮南子》、《贾谊新书》、《陆贾新语》、《说苑》、《新序》、《春秋繁露》、《论衡》、《颜氏家训》、《吴越春秋》、《华阳国志》、《干宝搜神记》、《刘向列女传》、《抱朴子》、《高士传》、《文中子》等，上述诸书，皆距秦代不远，虽为后人传说记载，但可信程度较大，可以援为研究之用。

全书或缺或佚，但书名或残卷尚存的文献。《黄帝内传》、《轩辕本纪》、《大禹岳渎记》、《尸子》、《燕丹子》、《金楼子》、《刘向别录》、《丧服要记》等，以上诸书或真或伪，现在都有残余部分。

搜集了大量谶纬之书，以补文献不足。《易则乾凿度》、《稽览图》、《坤灵图》、《尚书则旋玑钤》、《春秋元命苞》、《演孔图》、《运斗枢》、《感精符》等，以上诸书，都是汉哀平之际，托名孔子的附会之作。这类著作还有：《洛书灵准听》、《龙鱼河图》、《遁甲开山图》、《论语隐义》等，名目繁多。马氏对能搜集到的，都不忍完全舍弃。

文献注疏内容或类书中辑录的有关先秦史资料。《十三经注疏》、《史记索隐》、《史记正义》、

《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王逸楚辞注》、《郦道元水经注》、《六臣文选注》以及《左传》、《国语》、《世说新语》等书的注，这些注文中含有很多旁证议论，保存远古传说资料最多。至于类书，如《杜佑通典》、《初学记》、《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献通考》、《郑氏通志》、《玉海》、《说郛》、《事文类聚》等，这些类书中所引书目，都是今天不能见到的。有的连载数语，有的单存片言。总之，他对点滴可用资料，都要搜集。在资料搜集上，马氏几乎做到了"竭泽而渔"。这是《绎史》成功编著的基础。他对各类文献的分类，也颇便编著之用。他搜集史料，分类加以保存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研究工作，也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2、在史料运用和处理上，具有高度负责精神和富于启迪性。

对于事同文异的资料，不取折中录用之法，而是将事同文异的各种资料胪陈并列，让研习者和后学自己去考异判断。如对黄帝事迹的叙述，描述黄帝其人，马氏就录用了《史记》和《鬻子》两段不同记载。对于炎黄战争，马氏先引《帝王世纪》说："神农氏衰，黄帝修德抚民，诸侯咸去神农而归之。黄帝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帝王世纪》指明神农即炎帝。炎黄之战。就是黄帝与神农之战，接着马氏又引《新书》："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还把炎黄大战的战场改到了涿鹿，强调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因为这段资料比前述差异较大，马骕特别在小字注文里引《国语》、《归藏》、《新书》进行考据比较，使人们对《新书》之说，有了进一步正确理解。

对文同而人异的文献资料，则取在不同场合重复出现的办法。如《绎史·齐桓公霸业二》中，引《新序》记载：齐桓公田猎于麦丘，与83岁高龄的麦丘邑人对话。麦丘邑人两次为桓公祝福，都使齐桓公十分高兴，但麦丘邑人对桓公的第三次祝福，是希望他不要得罪群臣百姓。桓公听后不太高兴，并说，只听说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没有听说君得罪子臣的道理。麦丘邑人回答说："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姐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谢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汤，纣得罪于武王，此则君得罪于臣者也，莫为谢，至今不赦"。这段议论大开桓公茅塞，于是桓公"抚而载之，自御而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这件事在《绎史·晏子相齐下》引《晏子春秋》一段记载中，重复出现，只是麦丘邑人对话的人物是齐景公。《新序》和《晏子春秋》同录麦丘邑人的故事，只是谈话的对象不一样，《新序》认为是齐桓公，《晏子春秋》认为是齐景公。对于这种文同人异的资料，马氏则使之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著录。这种处理史料的办法，不仅作到了疑者存疑，给后人以考异的充分余地。而且还富有启迪性，使后人在编纂史籍时，也能借鉴这样的做法。此外，诸书用字不同，马氏抄录时也都依原样不作改动。如《公羊传》腏脩，《谷梁传》写成另锻脩，《公羊传》无骇卒，《谷梁传》写作无侅卒。《三礼》中"偏"字多写成"辨"，《吕氏春秋》中"仅"都写成"覲"，"期"字多写作"旗"字，《庄子》里"居"字多写成"姫"。这说明诸书用字各异，马氏在编撰《绎史》时，都不作划一或变更。充分体现出他尊重和忠实原作的负责精神。

3、在史学编纂上的融会贯通能力与创新精神。

《绎史》在编纂学上，取纪事本末体裁，即因事命篇，篇成本末。从《禹平水土》、《商汤灭夏》直到《秦始皇无道》、《秦亡》诸篇，马氏将先秦史上政治、军事大事，以事命题，各言始末，再依时间顺序，次第相接，从而清楚地勾勒出先秦时势发展之大势。对夏、商、周三代以前的传说内容，因文献不足，难详其事，即采用写《太皞纪》、《炎帝纪》、《黄帝纪》……《陶唐纪》、《有虞纪》等编年体叙事专篇，连缀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对于天地开辟、人类初始时难于确考的朦胧时期的历史情况，马氏则写了《开辟原始》和《皇王异说》两个专篇进行综述。这就把先秦史上真正的难

点，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处理。这无疑都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创新。对于内容丰富的西周礼仪法制，马氏写了《周官之制》、《周礼之制》等专篇，详加记述。这样纪事之篇就不再囿于政治、军事的内容，而把纪事内容延伸到西周官制和礼仪的领域中去。这是前人纪事本末史籍中所未曾见过的新创造。对于先秦时代的典志内容，他还撰写了《天官书》、《律吕通考》、《月令》、《洪范五行传》、《地理志》、《诗谱》、《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等专篇，这无异于把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反映出整个时代方方面面的内容之目的。《绎史》里《宋子罕为政》、《子产相郑》、《晏子相齐》等篇，内容极似纪传体史籍中专传的规模，实际上又是融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于一炉。运用之妙，前无古人。再如马氏《绎史》中写了《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孔门诸子言行》、《杨朱墨翟之言》、《子思孟子之言》、《庄列之学》、《鬼谷子纵横之术》、《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专篇，系统介绍了这些学者的生平、学术思想及流派门户等情况，极似学案体的学术史专著。这就等于把产生于明末清初的学案史体裁与纪事本末体体裁，凝结在一起，突出地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领域里的辉煌成就。《绎史》在《齐桓公霸业》中特别插入了《管子著书》的独立内容，这种把学术思想内容融入纪事之中的做法也是前人所未能为者。此外《绎史》还写了《扁鹊文挚医术》和《屈原流放》两个专篇，分别介绍了先秦医学及文学上的成就。总之，只要我们全面翻看一下《绎史》的内容，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马氏编纂史籍，惟以全面反映时代内容为目的，决不为史学体裁所拘泥，一当固定和成型的旧史体与表述全面的历史内容发生矛盾时，他就毫不迟疑地让史学形式极大限度地为容纳丰富翔实的历史内容去服务。为了全面反映先秦史的内容，他就采用了以纪事本末体为主，融典志、纪传、编年、学案诸体于一炉的办法，大胆创新，在历史编纂学上有所突破，创建出一种全新的史学体裁。马氏《绎史》除有体裁上的创新外，还制作了许多年表，连《孔子类记》中也附了《孔子年谱》。在《名物训诂》篇中附图象，在《地理志》后 附舆地图，真可谓图文并茂，充分显示出马氏在史学编纂上的融会贯通能力和创新精神。纪晓岚评价《绎史》时说："(〈绎史〉)虽疏漏牴牾间亦不免，而搜罗繁富，词必有征，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可及。且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①一部如此卷帙浩大之书，小有疏漏牴牾，是情有可原的。但纪氏把《绎史》与同类著述罗泌《路史》和胡宏《皇王大纪》相比，则认为马著远高罗、胡二史一筹，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纪氏特别强调：史例六家，古无此式。马骕著书，虽取袁枢纪事本末体，却又远远超出和突破了袁枢的旧体框架，纪氏认为袁、马皆可视为"卓然特创"。尤其是马骕《绎史》，"自为一家之体者矣"。看来纪氏的赞誉，也绝非溢美之辞。

二、马骕《绎史》中含蕴着许多进步的史学思想

1、考证务实，辨伪存真。

马骕在《绎史·开辟原始》篇中，对于述上古之事，应始于何时的问题，进行了周详的考证。马氏认为："乾坤定位，万汇繁滋，民生总总，气禀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万物，以为之主者，由是君道立矣。"②他认为，开辟原始，应首先着眼于人的出现，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只有人能主宰世界。而人类之中又出现了能够管理社会的君主，于是君道立，人类社会也就开始了。尽管他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但他考证的方法还是科学严谨，值得借鉴的。马氏既以君道立，为人类社会之始，那么君道又立于何时呢？他认为，对远古之传说，盘古、天皇时事，"当周季去古未远，而已叹古初之莫纪，矧百世以下，遭秦燔灭之余，而妄称上古之遗事，不迹于诞哉？"③"盘古以上谓无

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谓尽可指数乎？吾亦未敢信也”。④那么到底应以什么作标准来判断人类历史的开端呢？他说：“舍诗书六艺之文而妄称信诸子谶纬之杂说，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述洪荒以上之氏号者，斯好奇者之过也。”⑤也就是说，诗书六艺中所记的上古之事，应看作是可信的历史，而舍诗书六艺而专务述洪荒以上之氏号者，是好奇者之所为，不足为据。这些传闻，塞入历史，既无益于史学研究，又无助于政治借鉴。相比较而言，孔子的学术思想，更合于治国安邦，人伦日用，是可以付诸实践的。马氏以诗书六艺之文作为判断人类历史开端的依据，应该说是唯物的、实事求是的。马氏最后的结论是：“尚论者，断自庖牺氏可矣。”⑥他认为，古史开端应以伏羲氏为断限。这个结论，用今天的科学史观去看，是错误的。但马氏生活的时代，尚无科学史观作依据，他只能取通行的诗书六艺上的史观为依据，来考证古史开端。他结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他的理论基础是错的，而他的考辨方法却严谨而科学。他已经在古史开端问题上，驳倒了许多传闻中的无稽荒诞之论，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可贵的。马氏还用同样方法，订正了《史记》中关于尧舜记载的一些明显的错误。

2、以朴素辩证史观观察问题。

《绎史》在评论禹平水土时指出，禹平水土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作法与其父崇伯鲧的作法是相反相成的。导水与阻水作法相反，一个是以地让水，一个是与水争地，但是禹在以地让水时，仍然采用了阻水而导之的办法抑制洪水横流，使之按人的意图入江入海。即所谓：“禹导水由地中行，向鲧所为堤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辅水事”。⑦他总结出禹平水土，大功告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固有因败以为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⑧禹治水不仅能发挥自己治水的独特优势，还善于保留和运用他人治水的长处，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巧妙地结合运用，这就达到了“因败为功”的目的。这是比较典型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马氏还用同样思想，分析了周灭商的过程中，文王事纣与武王伐纣，虽然作法相反，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存道义，灭暴君，收到了异曲同工之效。

3、坚持历史发展观，以历史因果关系的变化论断史实。

在评论“陈氏专齐”的历史事件时，马氏以历史发展观进行分析。他说，齐国陈氏之祖陈公子完时，“厉公因乱而死，故完不得立。历事庄、宣二君，寻以御寇之难奔齐，辞卿位而为工正”。⑨但后来齐国发生内乱，“庆氏之败，陈氏有功，桓子为政，而陈氏渐强矣。”⑩齐国的陈氏家族，是因为平庆氏之乱有功，才逐渐强大起来。当陈氏强大后，又得到景公的宠信，这样陈氏才逐渐演变成齐国的大患。“夫景公齐国之显君也。然不能权自上操，弭祸乱于方治。惟田猎繁刑是尚，彼陈氏方且骤施于民，要誉于国，公在位日久，陈氏之得民日深。纵令早建世子，犹恐私行爱憎，间群子以启衅，况加私昵焉，是速之为乱也”。⑪结果，景公不用晏婴之言，景公死后，孺子做了国君被杀，四年之后，悼公被杀，又四年简公被杀。九年之内，齐丧三君。陈氏专齐，使齐国王族实力大大削弱。马氏认为，齐国之所以出现“陈氏专齐”之祸，主要罪责在于景公。他说：“原陈氏所以得其志者，由于景公之不振，君务为失民而臣务为得民，晏婴言礼可为国，孔子言君臣父子，公善之而不能用，身殁之后，祸不旋踵，三君之死，非景公其谁尤耶”？⑫这里马骕用历史发展观，具体分析了齐陈氏，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历史因果变化，最后清楚地找出“陈氏专齐”的历史原因。在《齐桓公霸业》篇里，马氏同样以历史发展观，分析了齐桓公从北杏会盟到葵丘震矜成为诸侯伯长的一系列因果发展、变化，从而完整清晰地勾勒出齐桓称霸的历史全过程。

4. 运用辩证比较法分析历史。

马氏概述了晋文称霸的简要过程后，对齐桓、晋文两霸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齐桓公之

霸,以管仲为相,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国力强大,威慑于诸侯国。所以"当齐桓之世,楚人非不强也,然而用师不过江淮之间,而召陵观兵,屈完来盟,齐无亡矢遗镞之费有楚服焉"。⑬晋文称霸时,"楚方号召中国,盟簿以来,诸夏咸拱和听命,非用大创"。⑭楚不但不能服晋,即使泗上诸侯也不会轻信于晋。历史背景不同,所以"召陵之师以不战为武,城濮之战以克敌为威。时势不同,迟速异效,齐桓、晋文之事,所由并著于《春秋》"。⑮因此称霸方式则一个以威,一个以武。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却在退避三舍后,仍要诉诸武力。齐桓称霸之时,尊内攘外,有翼戴王室之功。而晋文称霸,"诛不观状于郑国,责乘轩于曹人,请隧召王,威陵天子,凡其所为,往往报私怨而违礼义"。⑯正因为齐桓、晋文称霸方式不同,其称霸后的发展也不同。"春秋之于霸,姑略其心(主观意图)而言其事,若夫齐桓死,五子争立,霸业遂衰;晋则文公既卒,而襄公继之,墨经败秦,获狄子,讨楚党,一岁而服三强,文襄之烈,是以并称,又晋之踰于齐者也"。⑰马氏对齐桓、晋文霸业进行了上述比较后,认为齐桓以威取重,牺牲小而成功大,因此霸业基础不牢固,管仲死而霸业衰,桓公死,五子争立,国力锐减,很快就失掉了霸主的作用;晋文则在重重困难中创业,以武力克强楚,取威于诸侯,霸业基础较坚实,所以晋文卒,襄公继,文襄之烈并著于史,晋的霸业超过齐桓。马氏运用辩证比较法分析历史,比起诸家论齐桓、晋文,就觉颇有新意。在分析夏桀宠爱妹喜妲己,周幽迷恋褒姒而误国失政时,马氏同样用辩证比较法,找出了两者的异同。

5.继承了见盛观衰的传统优秀史观。

马骕论吴越争霸时指出:"吴越同域,世为仇敌,非吴有越,越将有吴,势使然也"。⑱吴越争端始于鲁昭公二十三年,"衅 自吴起,越受其伐。而阖闾入郢,允常乘虚以袭吴都,越获报矣。槜李之役,勾践败吴,阖闾伤趾而死。夫差嗣位,卧薪尝胆,义不与戴天。战胜,夫差遂以入越,子报父仇,何其壮也"。⑲接着,吴以艾陵之战胜齐,以黄池之役败晋,称霸中原。但夫差骤胜而骄,信越诈谀,许以降和,"伍员强谏不听,伯嚭贪佞取容。于是……越人生聚教训,阴谋沉虑,朝夕欲图其后而夫差不悟"。⑳最后落得个国破身亡,霸业灰飞烟灭。还是在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鼎盛时期,马骕就已看到"吴楚交恶,累年玩兵,吴获胜,楚越议其后,是越人党楚以挠吴"㉑的时势发展趋向。这对吴国非常不利,但夫差却毫无忧患意识,一味黩武贪功。马骕看来,夫差当时所取得的"胜利","适以误吴而速其毙耳"。㉒夫差认识不到,"若灭越,则楚国可定,吴霸可成"㉓的因果变化规律,而却好大贪功,最终招致覆灭的后果。吴灭后,"越人兼有吴土,号称霸主,驱使中国"。㉔马氏认为,吴之霸业,所以功败垂成,完全是"夫差为之也"。㉕马氏以见盛观衰的辩证史观,对吴越争霸的史实作了精辟的分析。在分析宣王中兴的历史时,马氏同样以见盛观衰的历史发展观,指出了周宣王以后,周王室必衰的症结所在。

6、重视人才,主张事在人为。

马骕在评议郑国子产为相之事时说,在郑国濒临灭亡之际,子皮委以大权,子产于是得到执政机会。子产为相后,作丘赋、铸刑鼎、杀不法贵族、兴农田水利,郑国大治,百姓乐业。他还善于抓住机遇,治理国家,协调国际关系。"晋悼霸而郑人赖以反正,晋楚成而郑人得以休息,萧鱼以后,国无外敌,入陈以后,国有兵威"。㉖马氏 指出:"子产为政,正郑国化,弱为强之时也"。㉗郑国一经他的治理,"外交固、内事举、民赖以安,惠孔厚也"。㉘他对子产所建功勋感叹说:"国非有强弱也,得其人者昌,不得其人者亡。郑小国耳,居南北之冲。自庄厉以来,晋楚交蹦其地,国之不亡幸矣。乃以五岁即位之简公,国家内乱,疆场外扰,悼共方争,边吏日警,而不数年间,外患以平,内政以修,解甲息民,国家晏然称治焉,谓非子产之力乎"?㉙他充分肯定了人才

对国之兴衰、事业成败的巨大作用，有力地论证了事在人为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真理。马氏还以同样的观点论述了宋国子罕为政后国势的巨大变化。

7、重视“时势”，认为历史“时势”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马骕在评论“晏子相齐”时说：“晏平仲之在齐也，历事三君，皆暗主也。……景公嗣位，若能委权任用，承霸国之余烈，晋失诸侯，齐国之兴，日可俟也”。㉚在齐国末世，晏婴赶上了齐景公当国的大好机遇，真想大展宏图，干上一番。可惜，“景公固非大有为之君也”。㉛“婴也随事补救，以讽谏匡君心者，朝夕不怠，危行言逊，故能身处乱世，显名诸侯，而齐国赖之以安”。㉜当时的齐国，以景公为首的旧贵族，日益腐朽不可复振，私家陈氏权重倾国，无法抑制。晏婴又偏偏不能毅然站在陈氏一边，摧枯拉朽，重建新的齐国。晏婴逆历史时势发展趋势而行，一生郁郁不得其志，到头来只能“登牛山而陨涕，其气衰，其志堕矣”。㉝马氏清楚地看到，个人意志是扭转不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尽管晏婴明白：他死后，齐将速衰，“此晏子所由对叔向而私忧，亦莫如之何也已”。㉞真是大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受。

同样，马骕在《孔子类记》篇后说：“夫子为政，化行俗美，而章甫作诵，教施政洽，而贾鬻无欺”。㉟可见孔子治国的道德准则很高，政治理想也很美。但孔夫子的政治主张同样不得伸展。正如马氏所言：“昔夫子生于鲁而不见用，唯定公能一用，用又弗终。以至周游列国，列国亦弗克用，终老于鲁”。㊱夫子周游列国“时夫子年五十余矣，三年之内，若将大行，而后中沮。于是适卫、适郑、适曹、适楚、畏于匡、困于宋、厄于陈、蔡之间，皆非夫子所得已也”。㊲当夫子返鲁之时，“是时哀公微弱，三桓益强”。㊳孔子之道，终不得行。马骕认为这是夫子道穷。夫子道穷，再一次使他感受到，违背历史“时势”就寸步难行的道理。但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百代素王的孔圣人，在其生世却如此穷窘，马氏心理是很不平衡的。于是只好用另一种赞美之辞，聊以自慰。“使夫子而为帝也，圣不过尧舜；使夫子而为王也，贤不过汤文；使夫子而为相也，功业不过稷、契、伊、周。若夫垂宪百王，作法万世，天之笃生夫子，非区区鲁国所得私也。则鲁之不用夫子也，固宜。”㊴试看，这段赞美中，又含蕴了多少酸楚之情啊！

8、坚持无神论，反对迷信怪异思想。

马骕在议论黄帝事迹时，认为“黄帝修德改政，习用干戈，战炎帝于阪泉，禽蚩尤于涿鹿，四征弗庭，罔不率服，诸侯尊之，遂王天下。盖自太古以来，以武定天下，黄帝其首称也”。㊵对于轩辕 这位华夏族的先祖，开基立业的大英雄，后世传说中怪诞之辞甚夥。一说：“谓驯扰猛兽，以战炎帝”。㊶马氏认为此说不可信。《尚书》说：“如虎如貔，如熊如罴”。这都是国帅武勇之号，就象后世所称虎牙骁骑一样。“而〈列子〉以为猛兽有人心，是妄也”。㊷又说蚩尤是“铜头铁额，八肱八趾，兴云吐雾，以迷军士。天遣玄女与魃，始克制服之”。㊸马氏认为蚩尤“是姜姓之人，绝非异类”。㊹上述传闻，实为荒诞之言。又说：“黄帝以仁易暴，汤武之事足以征矣，奚必征召鬼神，而后克济哉”？㊺因为黄帝建树了许多功绩，“逮秦汉之际，方士者流，始托为神仙之说，……谓帝得秘文内诀，召致天神，遍历名山，访真证道，长生度世，骑龙上升，举一切怪诞之谈，悉附会之”。㊻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蛊惑当世之人主”。㊼对于这些迷信怪诞之论，马氏在编纂《黄帝纪》时，采取了“故备论其事，俾读史者知所去取焉”㊽的办法。充分表明其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态度。

在评议老子学说时说：“史称老子者，所遗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盖其道以无为为宗，以守柔藏虚为智，清净淡泊，伏处远祸，不与世竞其芬华，史以为隐君子者也。著书五千言，贵道德而薄仁义，后世道家者流，咸以是为宗焉”。㊾马氏概括地写出了

老子道教 的基本内容与特点，但对于“世之言老子者，多神怪不经，谓寿且数百岁，或言生于周初，而神仙家言，其先天地生，历三皇五帝，变易名号，神化莫测”。㊿马氏对这些说法深不以为然。因此他收录老子道教内容时，认为“道家称为老氏之书者，多附托，不具录，录其五千焉”。(51)对于老子道教，仅取五千言《道德经》，摒弃了多于五千言几十倍的怪异之说不录。这再次表明了马骕坚持无神论，反对迷信怪诞之说的鲜明立场。

纵观《绎史》全书，其于史学，无论从资料搜集、史料运用、编纂体例创新、抑或史论思想的进步性诸方面，都有辉煌建树。马骕治史，不仅影响和推进了清代朴学的发展，还深深地启迪着后人。“后世学者，如龙文彬著《明会要》、柳诒征著《中国文化史》、邓之诚著《中华两千年史》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骕《绎史》的启示和影响”。(52)足见《绎史》的价值与作用。张之洞说：“史学亦宜专精一种。览虽宜博，欲求精熟，则亦贵专攻，但能精熟一、二种足矣。……国初马骕熟三代事，撰《绎史》，人称‘马三代’，此古人为史之法也”。(53)可见《绎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精品，享有很高史学地位。当然，《绎史》中也含有不少封建性糟粕，疏漏牴牾之处间或有之，仍需我们去认真鉴别。但它的许多优秀编纂方法或史学的进步思想，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与挖掘。

---

①《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纪事本末类·〈绎史〉条》。

②③④⑤⑥《绎史·卷一·开辟原始》。

⑦⑧《绎史·卷十一·禹平水土》。

⑨⑩⑪⑫《绎史·卷七十九·陈氏奔齐》。

⑬⑭⑮⑯⑰《绎史·卷五十一·晋文公霸业下》。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绎史·卷九十六·越灭吴下》。

㉖㉗㉘㉙《绎史·卷七十四·子产相郑》。

㉚㉛㉜㉝㉞《绎史·卷七十七·晏子相齐》。

㉟㊱㊲㊳㊴《绎史·卷八十六之四·孔子类记四》。

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绎史·卷五·黄帝纪》。

㊾㊿(51)《绎史·卷八十三·老子道成》。

(52)1993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绎史〉·〈绎史出版说明〉》。

(53)张之洞《书目答问》。